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1981

中篇小说选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

中 篇 小 说 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1981)
中 篇 小 说 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75印张 2插页 467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000册
统一书号: 19190·133 定价: 1.80元

编 辑 说 明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成绩卓著的部门。每年都有新人、新作涌现，佳作名篇迭出，令人美不胜收。为了检阅每年的创作实绩，使广大读者、作者、教学工作者、文艺批评和文艺研究工作者管窥一年又一年的创作面貌，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文学作品年编》。

我们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力求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采选出不同题材、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并注意反映文学思潮和艺术探索中的新的动向，反映各兄弟民族的创作成果。各类选本分别撰写前言，俾供读者纵览一年来的创作概貌。

本年编按照文学艺术之不同门类分为7种选本。张炯、蒋守谦总负责，各选本的具体编选者是：短篇小说：蒋守谦、沈太慧；中篇小说：张韧；诗歌：杨匡汉、楼肇明、雷业洪；散文特写：端木国贞；电影文学：翁睦瑞；戏剧文学：刘士杰；儿童文学：樊发稼、董志林。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荒煤同志、洁泯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专家曾给予热情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及有关部门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的青年同志为编辑和提供作品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一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按年编选各类文学作品，还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甚少，选本一定存在着疏漏和不足之处，竭诚希望广大读者多加指正，以便进一步改进编选工作。

1982年3月

前 言

张 韧

中篇小说以其异军突起的步伐已经走过了三年的历程。一九七九年是它崛起的头一年；一九八〇年已见繁盛之貌；第三年呢？古人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去年年初，人们不能不用焦灼、疑虑和期望的目光，注视着中篇发展的趋势。正当此时，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古华的《芙蓉镇》和张一弓的《赵镪头的遗嘱》，联袂而来，它们犹如惊蛰的春雷，猝然震动了文坛。接着，春去夏至，秋往冬来，四季百花烂漫开放，令人目不暇接。一年间，中篇小说竟达四百多篇，约为一九七九年的三倍，一九八〇年的二倍，真是一崛而起，一发而不可收。

评价一年的文学成就，要看其数量，但更为主要的要看它与往年相比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当我们欢呼一九八〇年中篇小说丰收的时候，也美中不足地感到，反映十年内乱的作品多了些，写现实生活的少了些。我们的时代是个除旧布新的时代，不但要总结历史的经验，而且还要为四化开辟道路。人民不会忘记昨天的创伤，但更寄希望于明天。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能不能得到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它关系着文学兴衰的大问题。中篇小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令人高

兴的是，去年的中篇小说跟上时代的脚步，它没有在“伤痕文学”里逗留，而是大踏步地突入到四化建设的广阔天地；在人物画廊上，一大批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居于显著的地位；活动于不同环境的多种多样的 人物，其性格呈现出更多的生动性、复杂性和典型性。如果说，文学的前进在于有所发现和突破，那么，这一年来，中篇小说在题材、人物和艺术手法方面确实都有所前进。它的兴盛景象，是前两年中篇小说崛起的延续、深化和发展。

过去一年内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改变了工业题材作品比较贫乏的局面，涌现出一批反映工业现代化建设面貌的好作品。这里首先要提到豁人耳目的《祸起萧墙》。尽管它的主人公傅连山的结局有违于他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但是他陷入佳津地区独立王国的重重包围之中，其悲剧又带有必然的因素。我们不应忽视这篇小说的缺陷，但更应注意到它的突破性的意义。人们还没有在哪一篇作品里看到，象《祸起萧墙》那样赤裸裸地捅开了工业领域改革与改革的尖锐矛盾，那样深刻地表现了集中领导与地方主义、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惊心动魄的冲突，那样生动地塑造了傅连山这个矢志改革、勇于行动的新人形象。如果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首先撩开了监狱的帷幕，让人们看到历史颠倒的真象，标志着中篇小说在拨开历史迷雾的战斗中而 异 军 崛起；那么，《祸起萧墙》则使中篇小说在反映四化建设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努力。紧接着，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周嘉俊的《下马部长》、柯云路、雪柯的《耿耿难眠》、单学鹏的《这里通向世界》、中杰英的《在地震的废墟上》、胡万春的《国宝》等，相继问世。它们弥补了工业题材小说的薄弱环节，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工业建设战线上进行调整、改革和由乱而治的新面貌。

这一组中篇小说多是写老干部走马上任、实行改革的故事。它们的题材同前年问世的《开拓者》等作品是相似的，但相比之下它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特点。《开拓者》主要是写省委书记车篷宽的雄韬大略、写上层领导者改革的决心和意志。一九八一年的中篇小说不但写了上层人物的运筹筹划，而且把笔锋探入到底层，努力开掘新的生活冲突，真实地展现了整顿与反整顿、改革与反改革的激烈搏斗的画面。这是其一。其二，对于站在生活激流的双方人物，作品不是简单化地、而是越来越着意地在特定冲突中写出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和典型性格，写出两种力量在斗争中彼此消长和生活发展的趋向。这两点，说明我们的作家对四化建设生活的观察和探索深入了，艺术表现力加强了；证明革命现实主义在中篇创作领域里不断深化。譬如说，同样是矛盾双方的人物，他们的个性迥异，斗争的焦点和手法也千差万别。《祸起萧墙》里的抵制电力工业改革的人物，灵魂浸透了地方主义、封建主义的毒液，他们的手段首先是一个“顶”字，企图把率先改革的傅连山“顶”出佳津；顶不出去，他们又起而“围”之，处处掣肘，把傅连山这头雄狮围困得一筹莫展。《这里通向世界》里的陈凡所施展的手段，主要是一个“奉”字。他觊觎港务局的第一把交椅，害怕新上任的老局长冯占雄。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所以他

用花园洋房，用美女把老局长供奉起来。这等于把冯局长“从劳改队接出来，又投入豪华的高级监狱”，使其与群众隔离开来，以便由他称霸于港湾。《上海的早晨》写了五十年代的资本家，用糖衣炮弹向党的干部进攻，到了八十年代，某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学会资产阶级的的一套把戏，用糖弹进攻那些立志改革的领导干部。我们的中篇敏锐地抓住了斗争形式的变化特点，从改革与反改革、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中，创造出冯占雄和陈凡这两个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来。

《耿耿难眠》中的董乃鑫则另有一番手腕。他讲究“信义”，善于结交，但又利用蛛丝勾联的“关系网”在曙光厂形成了与调整改革政策相对抗的派系势力；他懂业务，善于抓生产，但又利用生产率的上下浮动来要挟上级党的领导。他就是凭借着这种纵横捭阖的手腕，“挤”走了前任的几个党委书记。但新上任的书记杨林没有被他挤走，反而打碎了他的关系网。小说刻划杨林这个人物时突出他那种既有改革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精神的性格特征，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把转变人的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作品通过对他的深沉，持重和含威不露、慈严兼备的性格描写，一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政治家”的形象脱颖而出。

工业改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作家，包括那些比较熟悉以往工厂生活的作家，面对着新生活、新人物、新政策和新的问题，自然要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前几年写工矿企业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少，反映了我们的作家还处于认识

和思考的阶段。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和经济政策的深入人心，照亮了人们认识工业变革生活的眼睛。从乔光朴、车篷宽，到傅连山和杨林，从工业变革先行者的系列形象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到一条隐约可见的艺术轨迹。乔光朴和车篷宽以其大刀阔斧的开拓者形象而轰动了文坛，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和举措行动尚有可议之处，但是他们以情感人，以气夺人，其思想和行为反映了四化建设开始阶段人们渴望变革的急切心情。但是，多年来的极左思潮使不少经济部门病入膏肓，沉痾难起，仅仅是英雄们的振臂一呼是难以奏效的，它需要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调整和改革。傅连山和杨林，恰恰是经济调整和改革阶段中出现的新人。乔光朴和车篷宽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豪”气，傅连山和杨林则给人们以强烈的“实”劲。杨林和傅连山之间也有差异。傅不愧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实干家，但他似乎是勇气有余，策略不足，颇有一点“困兽犹斗”的味儿。杨林有勇气，但更注意领导艺术和讲究实效。他身上没有披上理想化的色彩，没有先声夺人的惊人之举，但他的“铁碗是通过组织体现”的，运用组织的力量和政策的威力，使曙光厂这潭死水终于掀起了向四化方向推进的波澜。从反映矛盾的复杂程度和生活的深度，从描写改革家与守旧人物的性格复杂性和斗争策略的变化看，我们的中篇对工业生活领域的探索不是日见深入了吗？

二

这一年的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突出的特点是注意反映农民的现实生活，敏锐地展示出农村变革过程中新的矛盾和

新的人物。如《赵镏头的遗嘱》《龙种》《鱼菱风景》《小溪九道弯》《春回大清河》《柳岸飞鹭》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的图景。

前年的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虽然出现了一些好的或较好的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甜甜的刺莓》《啊！古老的航道》及《老猎人的梦》等，但它们都是写农村动乱的历史。当时的短篇小说已经开始写农村的新面貌，通过“冯么爸”“陈奂生”这一类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的觉醒，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地位带来的变化。但是，如何正面描写农村生活的新矛盾和新人物，这是当时文学创作上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一九八一年的中篇小说，对这一点首先进行探索的是张一弓的《赵镏头的遗嘱》。在它之前发表的《春回大清河》，虽然写了“老牛信”在新政策面前的疑虑、徘徊和奋起，但它主要是写历年政策的变化在“老牛信”精神世界上的投影，它的创作路子仍然是《乡场上》《陈奂生上城》的继续。《赵镏头的遗嘱》突破了这条人们熟悉的路子，它从正面突入到农村生活的矛盾漩涡，清晰地展示出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过程中革新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画面。赵镏头不是冯么爸由政策落实而改变精神状态的那种人，他是执行新政策的带头人。他那种坚信党的政策的信念，那种大公无私、敢于拼搏的精神，反映了急于改变贫穷面貌的亿万农民的意志。

《赵镏头的遗嘱》和《祸起萧墙》，两者题材不同，一个写农村，一个写工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新时期的文学第一次写了四化建设生活中的悲剧，而且是带头实行改革的新人的悲剧。“伤痕文学”突破了不准写社会主义

悲剧的禁区，但它毕竟是写众目所睹的极左肆虐的历史悲剧。悲剧的历史终于过去了，三中全会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新的方针政策正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威力。那么，文学是不是还可以写悲剧？《赵镏头的遗嘱》和《祸起萧墙》作出了第一步的尝试。我们应当看到，四化建设正以势不可当的潮流，奔腾向前，但是生活中的逆流和漩涡依然存在。共产党员、宁波姑娘范熊熊，用死的斗争形式来抗议那些风气不正的官僚，就是一例。赵镏头以死来“表明心志”，以求实现他所追求的“神圣的使命”；傅连山要用“我的毁灭来震惊你们！”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用悲剧来警醒人们，不再重演悲剧。当然，我们的文学在写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时，要注意分清历史的总潮流与产生悲剧的特定环境的因素，要写出新人崇高的思想道德和他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在悲剧冲突中的胜利。“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我们并不鼓吹悲剧文学，但合乎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悲剧，于暴露中显出伟力，于挫折中昭示出胜利，它会产生出一种鼓舞人们追求真理、涤荡邪恶的艺术力量。张一弓所写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赵镏头的遗嘱》是两出震颤灵魂的悲剧，笔调严峻，铿锵有力。但是他去年写的《山村新人》，却是另一付笔墨，寓庄于谐，以一个土生土长的快板诗人的坎坷命运，折射出二十几年的农村历史的变迁。

叶文玲原是写短篇小说的女作家，她去年发表的《小溪九道弯》别具特色。作者说她喜欢写那些“不为人所器重或被冷落、侮慢的小人物”，写出他们“发光的心灵”。《小溪九道弯》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这种“小人物”，即农村的普

通劳动者。你看，农村年轻一代的谷雨，已经摆脱了悲苦的命运，他要“争我们整班种田人的大气”，终于把一座癞头山整治为花果山。葛金秋的生活道路比谷雨要曲折得多。这个纯洁、善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城里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改变一下贫苦的生活地位，但是几年的小保姆的生活，使她苦上加苦。“小保姆”的形象，在当代小说里是罕见的，但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和前途在哪里？是流入城市还是扎根农村？却是文学作品的老主题。不过，以往的作品大多是强调青年树立爱农村、爱集体经济的思想，避开了思想教育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男女青年们是爱自己家乡的，但过去的农村极左政策造成了经济的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进城谋生。文学作品回避经济生活的矛盾，孤立地去宣传青年安心于农村，这是难于揭示问题的本质的。《小溪九道弯》突入到了生活的底蕴。葛老司所以把自己女儿金秋送进城去，实际是生活所逼；金秋回来了，他所以笑脸相迎，因为“种田人的好政策”改变了这个老篾匠的经济地位，金秋在农村也有了安身立命和用武的天地。这篇小说探求年轻一代农民谷雨和金秋的不同命运时，之所以比过去同类作品更有深度，固然是作者的努力，但更为主要的是农村现实提供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生活依据。

向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开掘，加大历史生活的容量，这是去年农村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动乱的历史常常是文学奇葩的土壤，崛起的中篇小说不乏反思历史的佳作。但是，人们很少看到象《芙蓉镇》那样长幅的色彩缤纷的农村历史的画卷，那样众多而新鲜的人物。豆腐店的“芙蓉姐”、“北方大兵”谷燕山、冤案压身的“秦癫子”、“运

动根子”王秋赦、惯于兴风作浪的李国香，他们当中有历史的受难者，抗争者，也有极左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这些性格独特的人物，结成一个关系复杂的“小社会”。由豆腐店和芙蓉镇这个“小社会”，透视出风云变幻的大社会、大时代。作者古华善于把封建性的、极左的历史与乡土人情风俗画奇妙地揉合起来，他的《芙蓉镇》和短篇小说《爬满古藤的木屋》，无疑是应该列入去年优秀作品的行列中去。还有刘绍棠的《瓜棚柳巷》《花街》，南丁的《尾巴》等，都是描写农村历史画面的闪烁光彩的中篇小说。

三

反映当代青年生活、探索新时代青年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去年的中篇小说里占有显著的地位。其量之多，其质之优，都是近几年所未见的。不少作品一经问世即引起热烈的反响。一九八一年报刊上展开争论的，大都是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这不仅表明广大读者关注这类题材的作品，而且说明文学作品在如何描写当代青年生活和他们的性格特征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青年问题关系着四化建设的前景和祖国的命运。我们的作家在探索青年生活方面一直给予热情的注意。新时期文学的开路之作《班主任》，以及随后兴起的“伤痕文学”，描写了十年动乱时期青少年的遭遇和命运，揭示了林彪、“四人帮”给年轻一代造成的创伤。然而，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前进，我们祖国的青年一代，毕竟从十年风雨中走过来了。他们不能只顾抚摸身上的疤痕而悲思过去，生活在召唤他们

面向未来。作家敏感到时代的脉搏和青年心灵的变化，文学不能只让人类仍回首，还要激励青年追求理想的明天。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文学创作越来越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当代青年的形象。如获奖的中篇小说《蝴蝶》中的冬冬，“不愿当高干子弟”，不去北京而留在乡村走自己的路；《开拓者》中的“奇女”凤兆丽。在经济改革中是个敢想敢说、勇往直前的姑娘。但他们在作品中还是次要的角色。去年的中篇已经把青年一代的形象从次要的位置上升到主人公的地位，把他们从个人际遇和爱情离合的场面，移到工厂、农村和学校的大时代的场景上来，在社会变革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当代青年的风貌，歌颂他们为四化献身的崇高品质。

本书所选的海翔的《啊，生活的浪花》，应该说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并非是名列前茅的作品，但它是较早出世的一篇。它所提出的问题，如当代青年如何对待人生与理想、友谊与爱情、道德与情操，如何对待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何对待新老两辈的“代沟”问题，这都是当代青年关切的、也是在它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深入探索的问题。作者笔下的爱憎倾向和警策之语，透出了他对当代青年问题的严峻的思考。作品女主人公小莉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她从小憧憬神圣的事业，但十年浩劫使她万念俱灰。然而，历史新时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终于使这个大学生的理想复活了。她结束了苦闷与彷徨，从“生活扭转我”到她要“扭转生活”，这标志着一个曾是看破红尘的青年的觉醒。

写出人物性格的时代特征，这是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关键。我们这一代青年从十年内乱中长大的，他们不同于

五、六十年代的单纯而明朗的青年，灵与肉都带有程度不同的伤痕，这是当代青年的共同的特点。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可以写他们的伤痕，重要的是写出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伤痕。不少的优秀中篇不去追求伤痕的尖锐性，不去展览血污，而是着重揭示当代青年如何对待伤痕，表现他们热爱祖国、献身四化的时代精神。如果说，小莉是个从伤痕中挣脱出来、振翅欲飞的觉醒者的形象，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则是翱翔在新长征道路上的新人。作者蒋子龙很善于点染人物性格的时代色彩，他这篇小说所以比其它同类作品更见深度，是因为它把青年个人的志趣、爱好和追求，同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用社会主义思想这面时代的镜子去检验人物的性格特征。女主人公解净的生活道路比周围的青年似乎是一帆风顺的，但她有她的内心伤痕。正象她自己说的那样，“经过痛苦的思想裂变之后，多少领悟了一点人生的真谛，想走一条新路，重建人生的信念。”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解净的“领悟”二字，说明她从伤痕中经过思考而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这就是，不因个人的痛苦而颓唐，也不想浮在上面过着“文革牌”新干部那种毫无专长、悠闲自得的生活。她决心沉到生活下面去，拜群众为师，苦练驾驶汽车的本领，由外行变内行，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使汽车队由乱而治。与解净大相径庭的刘思佳，他虽然聪颖过人、技术高超，但他从历史的“恶梦醒来却感到走投无路”，所以他不满意现状，又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嘲弄现状；他蔑视庸人哲学，又用“吃吃喝喝、打打闹闹”来掩饰内心的孤傲和空虚。通过解净和刘思佳及其他几个青年形象的鲜明对比，作

品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一个真理，当代青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正确对待历史的伤痕，把个人的志趣、理想与祖国的命运、四化建设的前景联系起来。

同样的问题，有的作品却作出了另一种回答。《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李淮平和南珊，也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青年。作品立意于探索当代青年用什么样的信仰和理想来医治心灵的伤痕，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它让青年靠宗教的信仰来抚慰精神上的创伤，到宗教虚幻的“另一个世界”里寻求道德的完善和自我的解脱，去寻找人生的出路和归宿，这怎能让青年理智地看待历史和清醒地认识未来呢？《晚霞消失的时候》反映的是消极的遁世的情绪，而《在同一地平线上》则流露出一种畸形的处世思想。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历经忧患而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在他的眼睛里，艺术和人生就是“一场紧张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定局限制的拳击赛”。所以，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拼”，他简直象个红了眼睛的商人，把艺术当作猎取名利的工具，冷酷，自私，不择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挣扎！”作品的女主人公所以要和他离异，要从家庭中“走出来”，考入电影学院，因为她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加工资、提级、分房子，想干一个合适点儿的工作，也要靠文凭。”她与他在感情上有差异和纠葛，但他们的人生哲学，本质是一致的。作品偶而也写点群众舆论对他的非议，但从总的描写倾向看，同情多于批评，赞赏胜过指责。

我们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破除传统迷信和面向世界的时代。因此，新旧交杂的色调常常在思想最为活跃的青年身上折射出来，传统的与舶来的，陈旧与新鲜的，各种思